



鄧小平

与中国外交

王红续 孙浩 梁琳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邓小平与中国外交

王红续 孙 浩 梁 琳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与中国外交 / 王红续, 孙浩, 梁琳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62-1488-6

I. ①邓… II. ①王… ②孙… ③梁… III. ①邓小平 (1904—1997) —人物研究 ②外交—研究—中国 IV. ①A765②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3185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图书策划 / 胡孝文

责任编辑 / 陈棣芳

书 名 / 邓小平与中国外交

作 者 / 王红续 孙 浩 梁 琳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 / 21.5 字数 / 255千字

版本 /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488-6

定价 / 45.00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每每不能忘记他为中国外交写下的浓墨重彩的篇章。

摆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以“邓小平与中国外交”为题，由中共中央党校的几位学者撰写。在导言部分，作者分析了邓小平战略思维的几个方面及其特质，并以此引领全书的写作。该书分六章记述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的外交活动。包括：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实践、新的时代判断与外交战略调整、对美日外交的加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外交斗争、对苏外交突破与党际关系转折、时局动荡与外交战略交待。关于邓小平的论著包括外交方面虽已有不少，但是对邓小平外交战略作出比较全面和系统梳理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此书也因此值得一读。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较早接触到外交事务的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和占领南京期间，他是总前委负责人之一。那时，发生了英舰“紫石英号”事件和解放军战士进入美国驻华使馆问题。5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在中苏关系逆转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复出，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挑起外交重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邓小平参与的外交工作并不很多，但都十分重要。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培养与重用，使他积累起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对国际问题具有了卓越的洞察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

并很快主持外交工作，那正是酝酿和启动改革开放的当口。

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外交自然是这本书的重点，对有关问题的记述和探讨基本按专题方式展开。一本书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不同的写法和安排往往各有利弊。专题写法的好处是逻辑结构清晰，易于读者把握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而其不足是难以很好地反映历史进程的顺序和节奏，不利于解析各方面事务之间的复杂关联。其实，许多事情是平行发生、彼此交插和互相作用的。为更好地说明邓小平外交战略发展和实施的过程，我想在此强调一下某些问题发生的时序，并作些提示，以便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参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不过，这并非凭空而来，前提是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众所周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启动，邓小平预作筹谋，先行一步。1978年，他先后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国家；更重要的两个决断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完成中美建交谈判，在两国建交后旋即成功访美。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使改革开放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同和赞助。

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面确定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二是调整对外关系格局，明确中国外交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发展；三是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三点的作用是全局性的，不仅深刻影响着外交方面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内政、经济、国防、文化和祖国统一等各方面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点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经历了一个思考、提出、确定和实施的过程；从时序上看，

虽有先有后，但大体平行。作出决断的是邓小平，而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还有其他领导人。

重新判断国际形势，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得出“和平与发展”结论，经过十多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前，陈毅等四位元帅就对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提出质疑。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启动之时，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80年代初，一些中央领导人开始在不同场合提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1985年，邓小平明确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两年后，中共十三大更明确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似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逻辑前提；但事实是清楚的，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形成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在后。然而，这个判断一旦形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首先，这使中国可以不受干扰地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大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继而又使得中国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其次，在两极格局解体、苏东发生剧变之时，坚持这一判断使中国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并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据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最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也得益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总判断。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各方面的进展都离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环境。

相比之下，调整对外关系格局的问题提出较晚，形成决策很快，但完成乃是一个长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未改变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坚持这个战略，考虑的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由于“一条线”战略实际效果有限，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不得不考虑改变这一战略。1979年后，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并尝试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到1982年，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一条线”战

略，对外关系格局开始朝向全方位发展，即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以及各个方面内部的均衡。

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对美和对苏关系。邓小平重视中苏关系正常化，但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是大局，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这不仅因为苏联当时仍对中国的安全有所威胁，更主要的是苏联无法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时，邓小平巧妙地把握节奏，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改善对苏关系则不急不躁，使外界几乎觉察不到中国外交战略已开始变化。运用娴熟的外交技巧，邓小平成功地把国家的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需要结合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调整才变得引人注目。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终于完结。需要指出的是，此前中国与欧、日、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指双方建交，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含义是指双方不再对抗，也不恢复以往的同盟，而是转变为一种正常的、一般的国家间关系。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使得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能够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新诠释。事实上，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就开始了。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到1982年，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已十分明确。当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把中国外交政策总结为三句话：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对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此前后，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经常地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早已有之的提法来

概括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1986年3月，中国政府全面阐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包括的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既表明对以往外交基本政策的继承，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做了归纳和总结。至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度使中国受到巨大压力，但中国经住了考验。外交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中国外交趋于成熟的表现。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在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进一步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切实维护本国利益，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从外部压力，按照国情自主决定改革的步骤和速度，等等。而最为重要的就是韬光养晦，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遗产的分量，中国已经崛起并与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着。然而，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尚未达成。面对正在加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准备应对更艰巨的挑战。当朝着既定目标发起冲锋时，本书所展示的邓小平的远见、魄力和智慧仍将给我们以启示。

章百家

2017年7月24日

目 录

导 言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与外交成就	1
一、“猫论”的战略含义	2
二、大局观	6
三、“摸着石头过河”	11
四、战略预见和机遇意识	17
五、邓小平的外交成就	23
 第一章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实践	29
一、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战略	29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42
三、中苏论战	49
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党内分歧	72
五、“一条线”战略	81
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84
七、毛泽东时代宝贵的外交遗产	94
 第二章 新的时代判断与外交战略调整	99
一、拨乱反正与三大任务	99
二、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战略调整	109
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114
四、确立对外开放国策	119

五、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124
第三章 对美日外交的加强	130
一、促成中美建交.....	131
二、访问美国.....	144
三、“八一七”公报.....	160
四、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73
五、访问日本.....	193
第四章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外交斗争.....	208
一、把解决香港问题作为突破口.....	208
二、邓小平在中英谈判中的关键作用.....	219
三、指导解决澳门问题.....	237
第五章 对苏外交突破与党际关系转折	244
一、调整对苏政策.....	244
二、葬礼外交.....	255
三、打破谈判僵局.....	266
四、邓小平会晤戈尔巴乔夫.....	275
五、党际关系四原则.....	281
六、政党外交的恢复与发展.....	290
第六章 时局动荡与外交战略交代.....	295
一、国内外局势新变化.....	296
二、对多极化趋势的科学预见.....	305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提出.....	307
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深刻寓意.....	310
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长远价值.....	315

结 语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遗产	321
后 记	330

导 言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与外交成就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传承的伟大民族国家，或如西方学者所称的“文明国家”，具有悠久深厚的战略思维传统。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中国诞生了《孙子兵法》，奠定了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孙子兵法》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战略思维经典著作。英国大战略家李德·哈特盛赞孙子兵法，在他的传世名作《战略论》正文之前所引述的大量中西方名家的战略格言中，大多数来自《孙子兵法》。

深厚的战略思维传统，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思想根源。但是，15世纪以后，欧美的西方工业文明逐渐崛起，而明清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使中国文明失去活力和生机。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必然挨打。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蒙受屈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解放，并启动了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以其无私的牺牲精神和杰出的战略思维，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毛泽东、邓小平以其无与伦比的战略智慧，分别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和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亿万中国人民赢得国家独立，走上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

邓小平以“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大局出发”以及“抓住机遇”等独具特色的生动语言，表达了深邃的战略思维，成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总设计师。

一、“猫论”的战略含义

邓小平非常欣赏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战争年代，为了打败蒋介石，人民军队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他认为在建设时期也应当这么做。1962年，他在思考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提到这句名言，认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哪种形式能够恢复生产，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办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用这种观点解决了困扰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这种“猫论”，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首要标志。

在战争年代，能否打胜仗，始终是首要原则或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也始终是首要原则或目的。为了打胜仗，就需要有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了发展生产力，也需要采用高度灵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揪住“姓资”“姓社”问题不放，失去了灵活性。他对邓小平的“猫论”采取了否定态度。他批评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②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打倒了邓小平，使“文化大革命”得到延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邓小平的“猫论”，体现了战略思维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一切好的战略都是围绕目的与手段展开的。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方面，一切手段都是为达到目的服务的。因此，目的及目标是一切战略的出发点，是所有手段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讲，战略就是做事的方法，战略学就是成功学，即探讨如何成功地做事。在这里，战略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也就是要规定什么是正确的战略目的。

正确的战略目的归根结底要基于行为者的利益追求。无论是独立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所进行的相互交往，都是由物质与精神利益驱动的。对于国家来说，能够满足国家全体民众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需要的利益，是外交或国际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宿。19世纪的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久不变的。”^① 利益目的，既包括消极目的，又包括积极目的。消极目的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积极目的旨在拓展或增加利益。消极目的引导的是防御型的战略和战术行动，积极目的引导的是进攻型的战略或战术行动。战略目的特别是物质经济利益目的可以而且必须量化成行动目标，包括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努力目标。但是，本国利益又与他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且由文明多样性产生的多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又影响着每个国家对利益关系的处理方式。

在人类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经济活动是基础，政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政治目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其他各种目的都可以由政治目的来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主导手段，是对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的权威手段。可见，国家及政府运用政治权力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利益，即对利益资源的分配。权力主体能否达到目的取

^①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决于政治力量的大小。政治作为一门权威性的资源分配活动，又是一种调节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的艺术。调节利益冲突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双赢或多赢）两类。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一切为了人民，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准确把握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从而规定正确的战略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使命。在根本目的上作出错误选择和规定，将造成最大的战略失误，导致全局性的损失和灾难。

毛泽东在批评邓小平的“猫论”时，首先在战略目的和目标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和动摇。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岁月里，把阶级斗争当作“纲”，而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目”，这就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方面做了错误的规定，忽视了物质利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四人帮”把毛泽东的“左”倾偏向推到极端，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荒谬口号，把贫穷跟社会主义画等号，把富裕跟资本主义画等号。而邓小平的“猫论”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正确理解和规定之上的，注重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由此，他规定中国社会主义要做“正确的事”，他对新时期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这个战略目的展开的。

为了实现以政治目的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运用一切战略手段，以正确地做正确的事，高效地做正确的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① 他这个定义虽然是从战争视角下的，但也揭示了战略的一般性内涵：第一，战略服务于

^①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5页。

最高目的，即政治目的及本领域的基本目的；第二，要将最高目的具体地设计为量化的战略目标；第三，围绕战略目标，要使用各种手段，运用各种资源和条件，部署各方面的大小行动，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目的方面发生动摇和偏差，担心发展国民经济、人们富裕之后会“变修”，但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追求。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我们全面掌握毛泽东的观点体系。与邓小平在发展生产力上的坚定性相比，毛泽东则显得非常动摇，最后摇摆到“左”的一边去了。实际上，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大的优点在于明确战略目的之后，善于寻找和使用灵活的战略手段来实现它。1958年毛泽东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搞了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但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错误的战略手段，违背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没有深刻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反而对发展国民经济失去兴趣，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决心“兴无灭资”，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坚定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目的之后，又以高度的灵活性，寻找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各种有效的战略手段。他把目光转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这个现实而重大的问题上来，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他不仅不绝对地排斥西方资本主义，而且要最大限度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成果。他的“猫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他倡导的对外开放，首先和主要是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对日本和西欧开放。为此，他出访美国和日本，还访问了法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使他更加相信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中国的正确战略选择，更感到“左”倾思想的不合时宜。

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打倒邓小平，但他一直非常欣赏邓小平具有的这种战略思维特点。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有一次指着随他访苏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并在一次宴席上说，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刘少奇原则性强，但灵活性不足。毛泽东称赞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中肯评价，实际上也揭示了“猫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含义。

二、大局观

1973年12月，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他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第二年年末，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和王洪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周恩来曾经对刘伯承说，他特别欣赏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而且说他本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周恩来认为，这也许是同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集中表现在他的全局原则和大局观念。他把“举”全局之“重”，当作头等大事。1989年5月底，邓小平在组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做了意义深远的“政治交代”。他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他又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